

为了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周恩来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林立旭

中国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较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水患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旧中国,人民群众不仅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也频遭水患之害。新中国成立后,开国总理周恩来特别关注对水患的治理,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援他们”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毛泽东治理水患,主要倚重的还是周恩来。那个时候,长江、淮河发生水灾。特别是淮河水灾,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淮河水患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更是十分焦虑,他们都把治理水患当作头等大事来办。

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计划的轮廓很快就形成了。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物力还都很缺乏,加上西藏地区还有部分战事,朝鲜局势紧张后,中国也在组织军队向东北地区移动,也需要大量军用物资和军政费用。因此,形成的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虽然有了一个轮廓,但具体方案因财力、物力不济,一时定不下来。周恩来、傅作义和各位水利专家都很着急。

治淮计划轮廓已经形成,周恩来正在组织人具体论证,想要尽快研究、敲定成熟的计划稿时,毛泽东于1950年8月5日在他看到的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上写下了治淮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从毛泽东的文字之间,不难看出他的急切心情,也不难看出他已经下定了治淮的决心。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心情是一样的。他接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研究、落实的过程中,政务院把当时的治淮工程与当时的军事任务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不讲价钱地落实。这样一来,在本已紧缺的物资中,调配出了治淮物资,在本已紧张的财政中,挤出了治淮资金。特别是,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当时都把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治理淮河,作为治淮的一个重要条件放在治淮计划当中。这样,一个治理淮河的计划草案,终于在8月中旬拿了出来。

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此前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的问题。会议确定: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同时确定:要采用蓄泄兼筹的方针,还制定了治理淮河各方面协同的计划和治淮步骤。

政务院关于治淮的计划通过了,水利部关于治淮的工作方针也确定了,但在当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其他工作也很紧迫的情况下,要把这项具体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并相应改变其他工作计划,调动各方面力量来落实治淮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到各地党政军组织的支持。9月12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安徽省的民众反响更加强烈。这反映在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曾希圣在报告中提到: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

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曾希圣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曾希圣的这份报告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批道:“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周恩来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周恩来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水文特征时发现,

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周恩来抓紧时间,集中各地的意见,然后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策》,并于当天发布。在这个决定中,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泄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决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实的问题,为了落实治淮第一仗的打法,周恩来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水利局副局长熊梯云、总工程师王元颐的汇报,并认真做了记录。苏北选准开挖灌溉总渠作为治淮第一仗,对此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财政和物资异常紧张。按当时的国力,解决防灾抗解

脱人民的痛苦就已勉为其难了,要兴办灌溉水利工程是否早了点?有人提出看法。周总理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援他们。”周恩来又对苏北同志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随后当即批给大米1亿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足够的粮食是治淮的关键点。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治淮工程开始后,周恩来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说,做到了殚精竭虑。他的一次和水利专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话:“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来正是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的高标准来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线,对每个细节都认真了解,听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他还要求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加以整编,并且经常过问整编进度。不久,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整理出来,同时确定:要采用蓄泄兼筹的方针,还制定了治理淮河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流域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流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后几十年,淮河流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水患。

“好,我来管”

1949年长江发生大水,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鉴于此,周恩来考虑到,要有一个使长江长期不发生水害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对长江水患的治理,他一是组织领导了荆江大堤的建设;二是指示水利部门制订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规划。

1949年长江大水后,一些水利专家考虑搞一个荆江分洪工程,从根本上防止再发生大水灾。荆江大堤是荆江分流工程的主体。当年跟随周恩来参与领导这个工程的水利部领导同志回忆:由于荆江大堤规模浩大,要使达到御御较大洪水标准,其工程量非短

期内所能完成。为了解决长江防洪这个要害问题,我们从1950年2月开始就进行现场查勘,研究方案。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经中南局报送了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当年国庆节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汇报后,当即作出批准兴建的决定。决定作出后,周恩来就十分关心,并且作为一件大事,严格督促。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耽误一年动工,为此,周恩来对有关单位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南局务必于1952年开工兴建。在工程正式动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自挥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则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程刚开工不久,周恩来就打电话给从北京来到武汉的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询问为什么中央没有听到荆江分洪工程有什么困难的反映,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与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时解决。因而,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每秒1万立方米的两个泄水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竣工后,周恩来并没有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荆江河段系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就要扩大战果,进一步搞好其它配套工程。他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再研究种种彻底解决长江水患的方案。周恩来提出,你们除了坚持岁修工程以不断加强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还要将荆江防洪治本工程作为三峡工程规划的组成部分,先于三峡工程完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按照周恩来这个意见,提出了具有独立功能的荆江防洪工程方案。这个方案在研究和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多次关怀。1958年3月初周恩来冒雪勘察了荆江大堤。之后,又数次听取了荆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汇报,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兴建该工程的计划。虽然周恩来生前没有看到这个计划的具体落实,但他为此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基

础。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规划两个规划出台。这年年底,周恩来请毛泽东、刘少奇和他一起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听汇报后,三人有了在苏联援助下治理长江的想法。之后,周恩来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照会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据当年在水利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回忆:苏联专家组来华后,就上述两个规划,提出了与中方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接见了苏联专家组,并要科学家竺可桢一起听取水利部领导同志和苏联专家组陈述各自的观点。周恩来听完了双方不同意见以后,耐心地从事技术上,也从思想政治上向苏联专家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意图。之后,周恩来又在长江流域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从许多方面帮助解决问题,使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各个阶段都能顺利地提前完成规划设计任务。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江水补黄河水设想。这个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周恩来十分赞同,大力支持。在他亲自过问下,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作出了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控制工程的治理汉江、开发汉江、引汉济黄乃至引水至华北的汉江流域规划(简称汉流规划)。周恩来看到这个规划后,很满意,把这个规划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很满意。这个规划又经两年酝酿充实,形成了治理长江、南水北调工程的蓝图。这是当年中共中央抓的最大水利工程,轰动国家许多部门和几个大省。

1958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恩来,边这个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四个手指头比划说:“一年抓四次。”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就在毛泽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的当月(即2月)底,周恩来出访朝鲜刚刚回国,来不及休息,就赶到湖北,视察长江三峡。周恩来在视察长江的“江峡”号轮船上,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关于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情况汇报。当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问,是否确定搞丹江口水利工程时,周恩来果断回答:“同意建设丹江口水利工程,现在就应积极准备,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工了。”

周恩来管这个工程,费尽了心血。仅仅举他听取汇报为例,即可看出他

在治水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周恩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湖北,都经常听地方和中央的水文专家和水利专家的汇报。在听汇报中,周恩来得知,旧中国的长江水文资料很不全。特别是国民党时期的人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周恩来考虑后,提出,可以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式。据当年一些参与治理工程的同志回忆,水文专家按此办法做,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重量达一吨多记录100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要周恩来一年抓四次,实际上,周恩来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据当年一位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说,每次他到北京,周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1958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决定把这位同志起草的《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以便中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周恩来为了使这个报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使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研究时便于下决心,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周恩来这次查勘活动由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他们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恩来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峡坝址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多次关怀。1958年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成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献。

中央成都会议同时决定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施工。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决定,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主持该项工程,中央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当年跟随周恩来参加领导这项工程的领导同志回忆: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虽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胜利建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汉江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他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恩来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水产养殖“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

“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

周恩来治水患,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把治水患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有一句名言:“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句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高标准,即,我们治水,不光是防止水害,更重要的是要让江河湖海对人民有利。为此,周恩来特别着力于制定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的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代表时,对他们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正在草创,我们用大禹治水的精神,为人民除害造福。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亲自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水利建设的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

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水利建设的任务是:依据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物力及技术等条件,分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工程。

为了贯彻水利建设方针,完成水利建设任务,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都在搞土改。此时,有远见的周恩来就提出,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几件工作,第一件就是“兴修水利”。他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

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国家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仍然拿出了尽可能多的资金来从事水利建设。1950年,政务院用在水利建设上的经费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时期水利经费最多的那一年的18倍,1951年增至42倍,1952年增至52倍。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政府,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设经费。

他经常深入到水利第一线,调查研究,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水患的办法。他曾经亲自到治淮第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淮方案;他冒着风雪严寒视察荆江大堤;他三到三门峡,在水库工地上度过八个日夜;他亲自勘测三峡坝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解决问题。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即使是在外地视察或者开其他重要会议,只要听说有水利工程,他就要到现场看看。

原任铁道部长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黄河铁桥一号码头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周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飞行途中,周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一下飞机,周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实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周总理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周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情绪十分激动。周总理说:‘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开会期间,下了一阵雨,有人要给周总理打伞,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听了周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热情很高,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过十四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8月5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工人、战士、社员会面。”“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周总理不顾疲劳,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

“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周恩来在1972年11月21日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这

两件事都是大事。但是,做好这两件大事,又谈何容易!周恩来知难而进,在做这两件大事上都投入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对水利事业,他投入的精力相当大。凡是水利方面的大事,周恩来都亲自出面处理。

周恩来在领导人民治水患中曾讲过一句话:“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木砍多了。”治水治错了,好理解,如果一个大的水利工程发生失误,不仅劳民伤财,还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因此,周恩来治水患,如履薄冰,特别精心,特别细致,他几乎了解每个大的水利工程的细节。

但是,周恩来为细心担心林木砍多了呢?原来,周恩来治水患,特别看重治本。他深深了解,许多地方发生水灾,是由于林木砍多了,水土流失严重。他说:“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基于这个认识,周恩来在指导每个大的水利工程时,都特别强调要在周围多种树。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周恩来就总是强调,要在库区的山上多种树。当地遵照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在库区周围山上种了许多树。北京许多单位也长年组织人到十三陵水库周围山上种树。这个种树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

周恩来经常说,我国的林木是不够的,应该有计划地采伐,如果乱砍滥伐,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有计划地造林,经营林业。“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我国的林业工作搞好了,树木多了,我国的水土就能保持得好,就能减少水灾的发生。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培修和加固了4万多里的堤防,修建了官厅水库、引黄济卫工程,初步解决了历史上水灾严重的几条河流域的水灾隐患。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正如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说的:“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的。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待续)



刘鸿阳 作